

社会保险对进城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

卢海阳

(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 提升农民工的消费能力对于我国扩大内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利用 2013 年的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 通过实证分析系统地探讨了社会保险对进城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 城镇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影响, 但这种影响在不同收入、代际、来源地及发展取向的群体间存在差异。农村社会保险对农民工总体样本的家庭消费影响不显著, 但对中等收入组农民工家庭的消费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 进城务工时间、流入地常住人口、子女随迁等因素也会对农民工家庭消费产生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

关键词: 农民工; 社会保险; 消费; 群体差异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4) 04-0033-10

DOI: 10.3969/j.issn.1000-4149.2014.04.004

The Effect of Social Insuranc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LU Haiyang

(Management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enhancing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ha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By using survey data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2013,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and robustness tes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urban social insurance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But the impact varies between groups with different income, intergeneration,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The effect of rural social insuranc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was not significant for overall sample, but the consumption of the middle-income households will be affected negatively by rural pension insurance. In addition, duration of migration, the number of permanent residents in the city, and children migration status also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收稿日期: 2013-11-07; 修订日期: 2014-03-20

作者简介: 卢海阳,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Keywords: rural-urban migrants; social insurance; consumption; group differences

一、引言

消费在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中将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明确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如何有效扩大消费需求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农民工作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特殊产物,在扩大内需、解决就业和保持经济增长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2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6261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6336 万人。这表明,农民工巨大的消费潜力已使其成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外的消费“第三元”。尽管当前农民工工资水平低于社会平均工资,但是由于农民工总规模已经十分可观,从总量上看也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和潜在的消费支出^[1]。“十二五”时期,迫切需要更多符合中国实际的、有阐释力的关于农民工消费的研究成果。

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消费函数研究经历了绝对收入理论、相对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持久收入理论的变迁,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消费函数模型^[2]。与本文研究比较相关的是预防性储蓄理论,该理论认为,风险厌恶者的预防性储蓄随着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的变化而变化,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越多^[3]。除了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外,家庭消费也会受到其他不确定事件的影响,从而促使家庭进行预防性储蓄。由于保险可以降低未来不确定性事件给人们带来的经济上的冲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4]。基于这一理论,国内外学者对社会保险对家庭消费及储蓄的影响做出大量的实证研究^[5]。多数研究表明,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健全,居民的储蓄水平显著降低^[6~7]。恩根(Engen)等人利用美国失业保险制度改革的冲击识别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强度,发现对于面临较大失业风险或年纪较大的工人,失业保险对家庭储蓄具有较大的“挤出”效应^[8]。瓦格斯塔夫(Wagstaff)对越南的研究发现,在参加了医疗保险后,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有所增加,其中最显著的是非食品消费的增加^[9]。袁志刚等人较早提出收入不确定性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10],他的文献侧重于从理论上对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进行梳理和探讨,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之后的一些实证研究表明,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和改变中国现有的高预防性储蓄状况,关键在于降低预期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对消费者的影响^[11~13]。臧文斌等人利用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入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参保家庭的年非医疗消费支出比未参保家庭高 13.0%,医疗消费没有发生显著变化^[14]。还有学者通过从宏观的角度构建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社会保障制度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力度和时效,提出社会保障制度是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观点^[15]。董昕等人对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显著,但从系数估计值来看,这种影响比较有限^[16]。

纵观现有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其仍存在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第一,当前人们对于消费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展开,以农民工为对象的消费研究还比较缺乏,从不确定性的视角探讨社会保险对农民工消费影响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由于进城就业的农具有就业层次低、流动性强、劳动保障状况差等特点^[17],他们在城市的生活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他们而言,社会保

险是决定他们能否在城市立足进而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因素，也必然会对其消费行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第二，对社会保险与消费之间关系的已有研究主要探讨城镇某一类或几类社会保险对消费的影响，往往忽略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农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农村养老保险）对消费的影响。第三，现有研究忽略了社会保险对消费影响的群体间差异。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利用 2013 年全国 21 个省、市、自治区进行的进城农民工调研数据，对社会保险与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成果将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城镇化、市民化加速进程中不同群体农民工的消费行为。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1. 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特征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跨区域流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行为与机制研究”课题组 2013 年寒假期间开展的一项以进城农民工为对象的实地调查。本次调查是对全国范围内 21 个省市及自治区进行的实地问卷调研。调查者由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和浙江大学“三农协会”的学生组成。考虑到样本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我们从中随机抽取了来自浙江、江苏、天津、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广东、广西、陕西、福建、新疆、山西、吉林、黑龙江、辽宁、贵州、四川、重庆的 21 个省市的 100 名学生作为本次调查的成员，并在调查前对他们进行了培训。值得说明的是，由于本次调查的调查员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学生，我们只能根据学生的户籍来源地分配各个省市的样本量，所以样本难以避免会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偏差，即来自浙江的调查员及样本居多，这是本文的一个局限。但整体来看，本次调查数据覆盖面较广，所反映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和以往研究结论还是比较一致的，所以仍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此次调查采取农民工口述、调查员填写问卷的形式搜集数据，每位调查员在老家所在地级市的城镇地区通过随机抽样采访的方式抽取 15 位年龄在 16 岁以上的进城农民工（即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进行调查，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1206 份，有效问卷率为 80.40%。从表 1 所列

的样本特征来看：在来源分布方面，调查对象以本地农民工为主^①，占 47.98%，外来农民工占 52.02%。在性别分布上，调查对象以男性为主，占样本的 67.19%。在代际分布上，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 31.53 岁，其中 1980 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 63.12%，老一代农民工占 36.88%。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农民工占样本数的 64.74%，未婚者占 32.77%。从行业分布来看，27.71%的农民工从业于餐饮住宿为主导的第三产业，其次是建筑业，占 20.65%，交通运输业和环境卫生业的比

表 1 样本基本特征的统计描述

统计指标	变量	频数	有效百分比（%）
来源地	本市	578	47.98
	省内其他城市	214	17.76
	外省	414	34.26
性别	男	810	67.19
	女	396	32.81
代际	新生代	761	63.12
	老一代	445	36.88
婚姻状况	已婚	781	64.74
	未婚	395	32.77
	其他	30	2.49
所属行业	建筑业	249	20.65
	纺织、服装业	125	10.33
	电子、机械制造业	233	19.31
	餐饮住宿、服务业	334	27.71
	交通运输业	63	5.21
	其他	202	16.79

① 本文中的“本地农民工”表示户籍所在地为本市的农民工，“外来农民工”包括省内其他市和外省的农民工。

例相对较低，分别占 5.21% 和 0.67%。

2. 农民工社会保险与家庭消费的描述分析

(1) 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状况。社会保障制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或最基本的生活权利^[18]，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险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他们能否平等参与城市就业竞争，融入城市生活。如表 2 所示，目前农民工的城镇社会保险参保率仍然较低。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医疗保险）的参保率最高，占 37.78%，其次是城镇职工工伤保险（以下简称工伤保险），占 33.37%，再次是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养老保险），占 28.19%，城镇职工失业保险（以下简称失业保险）的参保率较低，仅占 14.25%。对比近几年关于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状况的研究发现，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状况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不过与城镇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状况还是有较大的差距^[19]。此次调查中参加农村医疗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比例相对较高，农村医疗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 79.86%、45.36%。除了工伤保险以外，女性农民工参加各类城镇社会保险的比例要高于男性。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各类城镇社会保险的比例较高，参加农村社会保险的比例较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比例相对较高，而参加农村社会保险的比例较低。

表 2 农民工城市家庭成员参保情况分布

统计指标		城镇社会保险				农村社会保险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农村医疗保险	农村养老保险
性别	男性	27.27	35.35	37.54	13.47	88.32	47.31
	女性	33.10	42.76	24.83	15.86	74.83	41.38
群体类型	老一代	28.22	30.98	31.60	11.04	83.13	56.75
	新生代	29.75	41.76	34.41	16.13	77.96	38.71
来源地	本市	30.05	40.87	31.73	12.74	82.45	51.44
	省内其他市	29.22	39.61	33.12	16.23	76.62	38.96
	外省	27.03	31.08	34.46	14.19	78.04	41.22
发展取向	城市定居	36.49	46.28	34.12	17.23	72.30	43.58
	返乡或其他	25.51	33.50	32.99	12.76	83.67	46.26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7.82	17.82	21.78	1.98	88.12	52.48
	初中	22.37	31.11	28.79	9.25	84.83	50.64
	高中或中专	32.26	41.58	37.28	17.92	75.27	37.99
	大专及以上	54.78	68.70	49.57	33.04	66.96	39.13
总体		29.19	37.78	33.37	14.25	79.86	45.36

(2) 进城农民工家庭消费分布。从表 3 可以看出，随着进城农民工的性别、代际、来源地、教育程度的不同，其家庭消费分布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来看，进城农民工的家庭消费水平明显偏低。2012 年进城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总消费约为 23933 元（根据臧文斌等人的研究，2007 年城镇居民家庭年均消费就已达到 24760 元^[20]），家庭人均消费约为 11376 元。多数农民工家庭年总消费在 20000 元以内，占调查总数的 57.42%。

(3) 进城农民工家庭总消费与分项消费的组间差异。如表 4 所示，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农民工家庭年总消费约为 27346 元，未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家庭年总消费约为 22554 元，两者的差异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值得指出的是，参加农村社会保险（至少参加一种）的农民工家庭年总消费要低于未参加农村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但是两者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分项消费中，除了食品消费、通讯消费和交通消费，城镇社会保险（至少参加一种）参保家庭和非参保家庭的各项消费存在显著差异。新老两代农民工在医疗消费和娱乐消费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医疗显著高于新生代

农民工，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娱乐消费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从来源地来看，本地农民工家庭和外来农民工家庭在医疗消费、娱乐消费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他消费的差异不显著。从发展取向来看，打算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家庭总消费显著高于打算返乡或有其他选择的农民工家庭。分项消费中，这种差异在食品、衣着、居住、应酬和娱乐等方面较为显著。

表 3 2012 年农民工家庭消费分布 %

统计指标		农民工家庭年总消费			
		10000 元以下	10001 ~ 20000 元	20001 ~ 30000 元	30000 元以上
性别	男性	27.30	31.48	18.96	22.26
	女性	24.74	29.97	19.16	26.13
代别	老一代	26.96	26.33	19.12	27.59
	新生代	26.15	33.70	18.97	21.18
来源地	本市	31.13	28.43	17.16	23.28
	省内其他市	23.49	32.89	18.12	25.50
	外省	21.53	34.03	22.22	22.22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30.93	34.02	18.56	16.49
	初中	30.47	29.69	19.27	20.57
	高中或中专	21.53	31.39	19.71	27.37
	大专及以上	20.56	31.78	16.82	30.84
总体		26.45	30.97	19.03	23.55

表 4 农民工家庭年消费的组间差异 元

开发项目	城镇社会保险		农村社会保险		代际		来源地		发展取向	
	有	无	有	无	老一代	新生代	本地	外来	城市	其他
总消费	27346 ***	22554	23669	25176	24781	23434	23180	24609	28087 ***	21870
食品	9677	9038	9206	9296	9020	9340	8764	9632	11070 ***	8304
衣着	1632 ***	1365	1442	1434	1477	1380	1625 **	1276	1688 **	1319
居住	6554 **	3737	4628	4138	4106	4797	4382	4688	5948 **	3823
通讯	1702	1438	1475	1699	1649	1435	1474	1551	1606	1468
交通	1404	1240	1261	1410	1295	1282	1241	1328	1296	1282
医疗	1359 ***	958	1098	963	1362 ***	904	1086	1064	1113	1055
应酬	2706 **	1908	2159	2034	2182	2110	2318	1973	2512 *	1940
家电	2035 ***	1201	1396	1665	1390	1530	1497	1392	1512	1407
娱乐	468 ***	304	334	431	180	448 ***	397 *	311	433 **	308

注：表内数据表示农民工家庭年消费的均值，由于篇幅限制并未列出标准差；*、**、***分别表示各群组消费差异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三、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1. 变量选择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保持社会稳定的一项制度和国家调节居民收入的一种手段，必然会对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收入路径、预防性储蓄以及对未来的预期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决策。此外，进城农民工在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状况、家庭规模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也会影响到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消费。因此，结合现有研究以及本次调查的数据情况，本文以农民工家庭总开支的对数（Y）作为因变量，取对数的目的是使数据更加平滑并降低可能存在的异方差。自变量分为社会保险变量、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其中，社会保险变量由城镇社会保险和农村社会保险组成，城镇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X₁）、医疗保险（X₂）、工伤保险（X₃）、失业保险（X₄），农村社会保险包括农村医疗保险（X₅）和农村养老保险（X₆）；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X₇）、年龄（X₈）、教育程度（X₉）、进城务工时间（X₁₀）；家庭特征变量

包括流入地常住人口 (X_{11})、子女随迁 (X_{12})、家庭总收入对数 (X_{13})；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就业风险 (X_{14})、发展取向 (X_{15})、身份定位 (X_{16})、代际 (X_{17})、来源地 (X_{18})、务工地 (X_{19})。

2. 模型设定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连续变量，且有两个以上的解释变量，因而考虑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具体函数形式如下：

$$Y = \alpha + \sum_{i=1}^{19} \beta_i X_i + u \tag{1}$$

其中， α 和 β_i 是待估计的参数项， u 是随机误差项。模型变量说明及样本的统计性描述见表 5。

表 5 变量说明及样本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说明	均值	标准差	预期影响
农民工家庭总消费对数 (Y)	2012 年全家在流入地的总消费 (原单位: 元) 的对数	9.86	0.90	
城镇社会保险				
养老保险 (X_1)	有 = 1, 无 = 0	0.29	0.45	+
医疗保险 (X_2)	有 = 1, 无 = 0	0.38	0.45	+
工伤保险 (X_3)	有 = 1, 无 = 0	0.33	0.47	+
失业保险 (X_4)	有 = 1, 无 = 0	0.14	0.35	+
农村社会保险				
农村医疗保险 (X_5)	有 = 1, 无 = 0	0.80	0.40	+
农村养老保险 (X_6)	有 = 1, 无 = 0	0.45	0.50	+
个人特征变量				
性别 (X_7)	女性 = 1, 男性 = 0	0.67	0.47	?
年龄 (X_8)	单位: 岁	31.53	9.69	?
教育程度 (X_9)	小学及以下 = 1, 初中 = 2, 高中或中专 = 3, 大专及以上 = 4	2.46	0.86	+
进城务工时间 (X_{10})	进城工作年限, 单位: 年	8.27	7.22	+
家庭特征变量				
流入地常住人口 (X_{11})	单位: 个	2.50	1.63	+
子女随迁 (X_{12})	是 = 1, 否 = 0	0.26	0.44	+
家庭总收入对数 (X_{13})	2012 年全家在城镇就业和家庭经营中获得的总收入 (原单位: 元) 的对数	10.66	1.29	+
其他控制变量				
就业风险 (X_{14})	被企业辞退的风险。有 = 1, 没有 = 0	0.23	0.42	-
发展取向 (X_{15})	城市定居 = 1, 返乡或其他 = 0	0.46	0.52	+
身份定位 (X_{16})	个人身份定位。城里人 = 1, 农村人 = 0	0.14	0.36	+
代际 (X_{17})	新生代农民工 = 1, 老一代农民工 = 0	0.63	0.48	?
来源地 (X_{18})	本地农民工 (本市) = 1, 外来农民工 (省内其他城市或外省) = 0	0.38	0.49	?
务工地 (X_{19})	包括浙江、安徽、江苏、湖南、湖北等 21 个省市及自治区	—	—	?

注: 由于篇幅限制, 务工地虚拟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未列示; 最后一列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期影响方向, “+”表示正向影响, “-”表示负面影响, “?”表示影响不确定。

四、实证分析结果

在模型估计之前, 先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结果得出, 方差膨胀因子 VIF 统计值均低于 10, 说明模型中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考虑到利用截面数据建立模型时难以避免某些解释变量缺失或样本数据观测误差而使干扰项方差增加, 从而产生异方差问题, 本文采用计算异方差 - 稳健标准误的方式进行统计推断。

1. 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

(1) 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表 6 的回归结果显示, 城镇社会保险对进城农民工家庭总消费的影响显著, 除了工伤保险的系数为负以外,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系数显著为

正。这一结果与董昕等人^[21]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从作用机制上看，参加社会保险有利于农民工家庭抵御未来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的风险，对农民工家庭的消费应该有正向影响。对工伤保险的系数为负的一种合理解释是，相对于没有工伤保险的农民工，有工伤保险的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危险性更大，面临的风险也更高，他们的预期收入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抵消且超过了保险的正向作用，对其家庭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本次调查也表明，参加了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从业于建筑业、机械制造业等高危行业的比例较高，占样本总数的 50.13%，而对于没有工伤保险的农民工，这一比例仅为 34.77%。农村医疗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并不具有显著性。

(2) 个人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进城务工时间的系数为正，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农民工进城务工时间的增加，其家庭总消费也随之增长。教育程度和进城务工时间都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体现形式：一般来说，农民工的教育程度越高，获得较高收入的可能性就越大，消费水平也会相对较高；进城务工时间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的工作熟练程度，也会对其收入和消费的提高产生重要的影响。模型中的教育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此次调查的农民工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者占样本总数的 88.32%，由于样本教育程度的同质性较高，所以差异难以体现出来。

(3) 家庭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流入地常住人口数对农民工家庭总消费的影响为正，并在 10% 的水平显著。正常情况下，随着进城农民工同住家人数量的增加，在城市各项生活开支也会提高。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家庭总

消费的影响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子女随迁对农民工来说意味着一笔较大的生活开支，这也恰恰映衬出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过程中，由于收入低、生活成本高而被迫让子女留守农村的现实。家庭总收入对农民工家庭总消费的影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经济学的消费理论相符。

(4) 其他控制变量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发展取向的估计系数为正，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打算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在家庭消费上要比打算返乡或有其他选择的农民工高出 16.98%。身份定位的系数为正，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根据炫耀性消费理论，消费是人们构建自身身份认同的手段，真正动机是获得一种社会身份认同，这种消费就是一种典型的“象征消费”和“符号消费”^[22]。对于打算在城市定居并最终融入城市社会的农民工而言，较高的家庭开支正体现了他们追求城市生活方式并实现与城市社会群体联合的愿望^[23]。从我们的调查中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打算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不再是一味的节俭，有

表 6 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估计系数	稳健标准误
截距项	7.9780 ***	0.6414
养老保险	0.1681 **	0.0813
医疗保险	0.1172 *	0.0756
工伤保险	-0.1517 **	0.0660
失业保险	0.1383 *	0.0855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0.0318	0.0756
农村养老保险	-0.0734	0.0692
性别	-0.0211	0.0662
年龄	-0.0027	0.0067
教育程度	0.0326	0.0272
进城务工时间	0.0098 *	0.0062
流入地常住人口数	0.0473 *	0.0244
子女随迁	0.3547 ***	0.0861
家庭总收入对数	0.1540 ***	0.0608
就业风险	-0.0728	0.0694
发展取向	0.1698 ***	0.0620
身份定位	0.1185 *	0.0796
代际	-0.0570	0.1297
来源地	-0.0460	0.0652
务工地		Yes
Adj R ²		0.2517
F 值		7.60 ***
Prob > F		0.0000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务工地虚拟变量的系数未列出。

的甚至是“赚多少、花多少”的“月光族”，他们羡慕并努力适应着城市的生活方式，不再愿意回到农村生活。

2. 社会保险对不同收入的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

本文根据进城农民工 2012 年全家在城镇就业和家庭经营中获得的总收入分布将所有样本分成三组，即家庭年总收入在 35000 元以下的家庭为低收入家庭（约占总样本的 25%），收入在 35000 ~ 70000 元的为中等收入家庭（约占总样本的 50%），收入在 70000 元以上的家庭为高收入家庭（约占总样本的 25%）。表 7 为不同收入组的回归结果。

表 7 不同收入分组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低收入组		中收入组		高收入组	
	估计系数	稳健标准误	估计系数	稳健标准误	估计系数	稳健标准误
养老保险	-0.1323	0.1880	0.2719***	0.0957	0.1415	0.1579
医疗保险	0.4325***	0.1738	0.1436*	0.0883	0.0037	0.1240
工伤保险	-0.1567*	0.1045	-0.1244*	0.0856	-0.1174	0.1305
失业保险	0.5719***	0.2425	0.1035	0.1025	0.0690	0.1709
农村医疗保险	0.1606	-0.0293	0.0614	0.0989	-0.0582	0.1127
农村养老保险	-0.0293	0.1643	-0.1751**	0.0776	0.0118	0.1087
Adj R ²	0.1794		0.1882		0.2676	
F 值	2.52**		4.50***		4.12***	
Prob > F	0.0014		0.0000		0.0000	

注：以上模型均包含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及其他控制变量，由于篇幅限制，系数并未列出，下表同。

结果显示，社会保险对不同收入的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低收入家庭，城镇社会保险中除了养老保险的系数不显著以外，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影响均为显著，其中失业保险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医疗保险。对于中等收入家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影响显著，失业保险的影响不显著，其中养老保险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医疗保险。而对于高收入家庭，城镇社会保险的影响都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对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显著，但对于中等收入家庭，农村养老保险的系数为负，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至少要求两个条件，一是具有市民化意愿，二是具有市民化能力。家庭收入状况是反应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重要方面，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工家庭，即便有较强的市民化意愿，也可能会由于难以承担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最终选择回到农村生活，他们属于常年进城务工经商、季节性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候鸟型”农民工。对他们来说，城镇养老保险的作用并不明显。相对而言，中等收入的农民工家庭的市民化能力较强，他们属于基本已经融入城市的“沉淀型”或“筑巢型”农民工，对他们来说，养老保险是其选择在哪定居的重要决策依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城镇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归属感会更强，在城市的消费也会更高，而有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往往将农村老家视为最终的归宿，城市只是临时打工的地方，他们通常不愿意或者尽量降低在城市的消费，而把更多的收入储蓄起来或寄回老家。由于高收入农民工家庭的经济风险抵抗能力较强，所以社会保险对其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3. 社会保险对不同代际、来源地、发展取向的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

按照代际、来源地、发展取向将所有农民工进行分组，分别对相应的子样本进行回归，表 8 显示了不同子样本的回归结果。

表 8 的回归结果表明，城镇社会保险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比较显著，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意识更强。相对于本地农民工，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受到城镇社会保险的影响更加显著，说明外来农民工由于离家较远，他们在城市务工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表 8 不同子样本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代际		来源地		发展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	老一代农民工	本地农民工	外来农民工	城市定居	返乡或其他
养老保险	0.1909 **	0.0919	0.0625	0.2984 ***	0.3409 **	0.0762
医疗保险	0.1019 *	0.1721	0.1554	0.0866 *	0.1169 *	0.0747
工伤保险	-0.1723 **	-0.0816	-0.1072	-0.1777 **	-0.1588 *	-0.1158 *
失业保险	0.1056	0.0599	0.0428	0.2192 **	0.0685	0.2270 **
农村医疗保险	-0.0600	0.0576	-0.1397	0.0705	0.0446	-0.0673
农村养老保险	-0.0567	-0.0885	-0.0485	-0.1181	-0.1247	-0.0433

更大。此外，不同发展取向的农民工受城镇社会保险的影响也不相同，对于打算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比较显著，而对于打算返乡或有其他选择的农民工而言，失业保险的影响比较显著。该结果说明社会保险的确会对农民工家庭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影响的显著程度在不同的群体间会存在一些差异。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 2013 年全国 21 个省市的进城农民工调研数据，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影响，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影响为正，工伤保险的影响为负。城镇社会保险对不同群体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更显著，而相对于本地农民工，社会保险对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则更为显著。不同的险种对各收入组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总体看来，社会保险对中低收入的农民工家庭消费影响较大。

本文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说明完善包括养老、教育、医疗等在内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降低了农民工家庭收入的不确定性，对于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比例仍然较低，改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福利任重而道远。工伤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表明，对于一些职业风险较大的农民工来说，工伤保险的作用并不足以抵消其工作危险性所带来的收入不确定性。在调查中了解到，虽然一些农民工参加了工伤保险，但是由于他们知识水平较低，对工伤保险知识所知甚少，加上工伤认定程序比较繁琐，处理时间跨度较长，在工伤认定过程中他们承担着较大的心理负担，不少农民工往往选择中途放弃工伤认定。今后应大力宣传农民工工伤保险法律知识，提高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参保率。同时也应简化工伤认定及赔偿程序，监督和规范用人单位，加强执法力度，防止出现用人单位在工伤保险方面的逃保、漏保现象。此外，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其内部结构已发生分化和变化。基于农民工群体存在差异的现状，应有序推进农民工工伤、医疗、养老等各类社会保险险种的实施，提供协调农民工不同收入群体的居留意愿和城市消费能力的社会保险制度，合理确定农民工的保险待遇水平，以免过高的保险费用使农民工负担过重。在设计具体的消费政策时，应根据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群体分化状况及其消费行为差异对该群体进行市场细分，根据各个群体的消费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来构建相应的分类政策体系。

参考文献：

[1] 蔡昉. 农民工市民化与新消费者的成长 [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1, (3).
[2] 朱信凯, 骆晨. 消费函数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化: 一个文献综述 [J]. 经济研究, 2011, (1).
[3] Leland, H. E. Saving and Uncertainty: The Precautionary Demand for Saving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8, 82 (3).
[4] 王曦. 当期收入还是永久收入: 转型时期中国居民消费模式的检验 [J]. 世界经济, 2002, (12).

- [5] Guariglia , A. , M. Rossi. Private Medical Insurance and Saving: Evidence from the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J].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04 , 23 (4) .
- [6] Hubbard , R. G. , J. Skinner , and S. P. Zeldes. Expanding the Life-cycle Model: Precautionary Saving and Public Policy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 84 (2) .
- [7] Chou , S. , J. Liu , and J. K. Hammitt.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 Evidence from Taiwan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 2003 , 87 (9) .
- [8] Engen , E. M. , J. Grube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 2001 , 47 (3) .
- [9] Wagstaff , A.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Health Shocks: Evidence from Vietnam [J].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 2007 , 26 (1) .
- [10] 袁志刚, 宋铮. 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与我国经济增长 [J]. 经济研究, 1999, (11) .
- [11] 樊潇彦, 袁志刚, 万广华. 收入风险对居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 [J]. 经济研究, 2007, (4) .
- [12] 万广华, 张茵, 牛建高. 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 [J]. 经济研究, 2001, (11) .
- [13] 邓可斌, 易行健. 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异质性与消费倾向的变化——基于中国城镇居民的研究 [J]. 财贸经济, 2010, (5) .
- [14] 臧文斌, 刘国恩, 徐菲, 熊先军. 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J]. 经济研究, 2012, (7) .
- [15] 姜百臣, 马少华, 孙明华. 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 (11) .
- [16] 董昕, 张翼. 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2, (10) .
- [17] 高文书. 进城农民工就业状况及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石家庄、沈阳、无锡和东莞为例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6, (1) .
- [18] 任丽新. 农民工社会保障: 现状、困境与影响因素分析 [J]. 社会科学, 2009, (7) .
- [19] 卢海阳, 钱文荣. 就业状况、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市间再流动意愿 [J]. 南方人口, 2013, (2) .
- [20] 同 [14].
- [21] 同 [16].
- [22] Trigg , A. B. Veblen , Bourdieu , and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 2001 , (1) .
- [23] 余晓敏, 潘毅. 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 [J]. 社会学研究, 2008, (3) .

[责任编辑 冯 乐]